

周氏兄弟杂文的异同

概念之同:鲁迅确立“杂文”之名在周作人之前,但他的“不管文体”和周作人所言“名称不成问题”、“文就是文”,立意相同。另外,和周作人一样,鲁迅在现代白话文意义上使用“杂文”这一概念,最先也是借自中国文学传统固有的杂文概念而加以变通和发挥,强调“古已有之”,显示了其文章取径向着传统的某种回归。

内容之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1926年)和周作人的“思想革命”(1919年),是他们杂文的问题意识(即思想)的最大共同点。

诗与真的分野:鲁迅是诗人气质的爱真实的作家,周作人是严谨的学者气质的同样爱真实的作家。一是诗人之真,一是学者之真。

智与情的偏重:周作人说他基本属于“爱智者”,鲁迅则提出六个“敢”(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一偏于智,一偏于情。或者说,鲁迅是“主情的文学”,周作人则是“主智的文学”。

“口语本位”与文言因素:鲁迅的“文”充分吸收了口语精神,文言因素融化在作为本位的口语中,并不费解;周作人的口语却有不加消化的文言的硬块,更显晦涩。

腔调与反腔调:如果说,鲁迅是为了充分表达感情而刻意追求文章的声调之美,周作人则是为了思想的明晰而刻意放弃乃至回避文章的声调之美。

选摘自《南方文坛》第1期,郁元宝/文

旅游为何缺文化

出门旅游看什么?是否参观美术馆?这个问题涉及游客的文化素质问题,也涉及整体的国民素质问题。但是,若游客不参观美术馆,便真是国人没素质,还是中国旅游没文化?

我买了不少出行欧洲的旅游手册,多是欧美出版的英文系列丛书,既有大部头的全域旅游通览,也有欧洲名城的一本小册子。这些手册的共同特点,是介绍各地旅游景点时,会推荐当地的主要美术馆或艺术博物馆,甚至将其列为旅游首选,例如巴黎的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立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以及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等等。到这些地方参观,主要是看画,看欧洲历代艺术作品。

我也买了不少国内出版的中国旅游手册,也是各种丛书,包括各地旅游通览和主要城市的一本小册子。这些书的最大特点,是很少有或者干脆没有各城市美术馆或艺术博物馆的介绍。比方说,前两年的夏天我都在旅游名城杭州度过,但手头的旅游书,却没有列出杭州的美术馆。我在杭州居住的时间加起来近半年,其间竟然没在当地逛过一个美术馆。不消说,看画并不在国人的旅游日程中。

我几乎每年都到欧洲旅游,所到之处,总是从一个美术馆到另一个美术馆,马不停蹄地奔波参观,美术馆是我出行欧洲的首要目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像我一样喜欢看画,也许他们对美术馆没兴趣,因为他们并非艺术家。那么,游客出行究竟看什么?所谓“观光”,如果就是观看风光,那么什么是风光?国内的旅游手册介绍的多是山水风景和古镇遗迹之类,即所谓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可是,游客们也并非都是生态学家或考古学家。

关于中国游客出游不参观美术馆的问题,在此便成了另一个问题:究竟是游客的文化素质低,还是旅游手册的编者文化素质低,或者是艺术博物馆的文化素质低,抑或三者互动?

选摘自《中国文化报》1月29日,段炼/文

赵园谈学术转向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多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取得相当的造诣,后来却转向明清之际史学领域的研究,花了十数年心血相继撰写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引起学术界的瞩目。日前,她出版了新著《想象与叙述》,并接受了《书城》杂志的采访。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转向时,赵园表示她由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士大夫的某种精神气质所吸引,这种气质不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而是那种严肃。令其感动的,是一种“人格魅力”,甚至有儒家之徒对于修身的郑重。“无论讨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开田的谈论,我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尽管正是那种‘道德严格主义’值得分析甚至质疑。在一个堤防随处溃决,似乎一切都漂移不定的时期,我的确怀念那种严肃:对历史的庄重承诺,对意义的追寻。”“明清之际吸引了我,始终是人,是人物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复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即使对‘学术工作’无所助益。设若没有那些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兴趣将这项研究坚持至今。”

选摘自《书城》1月号

耻辱的和平?

“60年来,法国的战败和沦陷时代,仍然是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困窘的话题,这段被让·谷克多成为耻辱和平的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制造着某种微妙的倒错”。纽约巴德大学教授伊安·布鲁玛说,“艺术、文化生活,似乎是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后,它拥有的惟一保持自身尊严的武器。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法国艺术家该为自身的创作活动负担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个高度争议与难以量化的问题”。从2009年初开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弗里德里克·斯波兹的《耻辱的和平——纳粹占领时期法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生存实录》和文艺批评家让·卡苏的个人回忆录《巴黎沦陷记》,以及海伦娜·贝尔、菲利普·朱利安等人的个人日记等一

纳粹占领时期法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生存实录

系列新版著作构成了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在最初的恐慌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却选择回到了沦落在征服者铁蹄下的巴黎,个中原因何在?“首先,流亡是一条艰难的路,法国艺术家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慷慨解囊的法国赞助人,新大陆上的语言与文化障碍也是令他们望而生畏的重要因素”,斯波兹说,“其次,对寓居巴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贸然离开自己的观众、听众、出版商和读者就意味着创作生涯的终结。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帝国精心制定的管理政策,希特勒很清楚地认识到,对即将进军苏联的第三帝国来说,法国需要成为稳定的后方,对于法国的管理,特别是文化生活的宽松,是使这个注重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欧洲大国俯首帖耳的重要保证”。于是,一种奇怪的和平繁荣实现了。灰色的抵抗 在这种沮丧的环境,以及被迫害者永远是少数的情况下,针锋相对的反抗顺理成章地缺乏动力和紧迫性。在左岸,这个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和反抗精神的大本营,萨特、波伏娃和保尔·艾吕雅尝试当朗朗诵萨特创作的讽刺剧本,但他们的著作依然被允许出版。是否巴黎文化与

“职场小说”为何火爆

个普通人能成为比尔·盖茨,“美国梦”式的“成功神话”只是庸常人生里一个遥远的冥想。从幻想中绝望地回到现实,反而发现“杜拉拉”式的小人物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小说作者李可所说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她的故事比比尔·盖茨的更值得参考。

在此之处,《杜拉拉升职记》的流行就显得别有深意。小说借助一种亲切的形式和温暖的叙述基调,连同“杜拉拉”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冲淡了“升职”本身所包裹的残酷资本法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杜拉拉”们受

到很多有着同样经历的职场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杜拉拉”们的故事毕竟只是故事,尽管它打着“白领外企生存法则”的招牌,被冠以职场宝典和“厚黑学”的名号,但它终究只是迷离的“纸上叙述”,是对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按图索骥的“职场指南书”。残酷的现实原则和道德羁绊,往往使得中产阶级殚精竭虑的“努力”付诸厥如。然而这种想象性的满足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在严密的资本牢笼上找到了一处宣泄的裂口,使得匍匐在丛林法则里的囚徒们得到一丝安慰,也给整个社会资本再生产提供了运转的能量。就这样,在我们想象中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职场达人”,她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普通,却精通各种人事规则,有着战无不胜的伟力,她就是“杜拉拉”,她是我们自我平庸生活的“镜像”。

选摘自《中华文学选刊》一月号,徐刚/文

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

面对网络文学的迅速崛起,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参与到网络文学的整体创作活动中。尽管网络文学拥有传统文学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方面,网络文学创作缺乏经典意识,优秀作品难得一见。另一方面,在文学生活实际化的生存氛围下,一些网络文学在点击率的攀升中,缺失了宽广深厚的现实生活、丰富独特的民族精神、至诚至善的人伦情感等内容。这种情况下,广大读者需要文学批评“别裁伪体”,而广大网络文学作者也需要借助文学批评进行反观和促进。然而,目前网络文学批评基本是缺失的。一方面,网络文学批评没有形成真正的批评理论,网络文学创作一直是在批评滞后和话语失范的状态下发展的。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网络文学创作。使网络文学创作处于前后失据的状态中。

如何强化对网络文学的批评呢?其一,促成传统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的融合,形成适合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批评理论。其二,更新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建构多样化的文学批评方法。其三,加强网络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也注重网络文学本身的特质。

选摘自《人民日报》2月5日,郭国昌/文



趣味与品味

休谟名言“趣味无是非”是个残句,至少它很容易被曲解为“趣味即任意”或“趣味不可共享”。还是康德讲得清楚:鉴赏力是有客观依据的,美并非是一个由个人主观任意决定的范畴……两百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把这些概念混淆使用,趣味、鉴赏力、美,统统弄成一个暧昧的词——品味。

就文学而言,近日之品味既不是新文体更谈不上是新风骨,品味生机勃勃却洋溢着喧闹的陈腐之气,它的杂乱文体和庸俗风格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品味群体的需要,品味没有任何创新的愿望也没有任何创新的能力,品味是廉价的、可随时选用的、任意拼凑的以及恣意剽窃的,它属于任何人,品味的主人是缺席的。品味永远在场,它寄生于一切媒介之躯,人人触手可及。

据说,这也算众声喧哗的时代,聊胜于无,同无声的时代相比,姑且算吧!

选摘自《上海文化》第1期,谢穆/文

“天价艺术品”现象分析

武洪滨在对当代艺术品屡屡被拍出天价现象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其一,当代艺术运用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样式与独特语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现出特有的时代特征与艺术性,这种艺术观念的当代性是其市场走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当代艺术的去主流、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艺术态度与以往的艺术样式大相径庭,给人们一个全新的审视时代与社会的视角,这无疑给嗅觉敏感的西方市场眼前一亮的感觉,同时也刚好契合了后殖民文化视野下西方窥视东方的心理与文化认同,这样当代艺术大张旗鼓地登上国际舞台就顺理成章了。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妖魔化”、“艳俗化”、“泛政治化”艺术样式在中国的泛滥;最后,一些海外藏家专门从事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买卖,利用时间差,将手中低价购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再次回销中国市场,完成利益套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走红可以说是国际市场获利链条中的一环,只不过这一环节处于较低位置,在一场商业逐利的游戏中不自觉地扮演了从众的形象,这是中国艺术市场所应当反思的。

选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期

扳不动

原载《中国日报》二月28日,罗杰作



米拉麦克斯面临倒闭

母公司迪士尼准备关闭独立电影制片公司米拉麦克斯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办事处,目前,米拉麦克斯公司还有六部等待制作和发行的电影前途未卜。很多业内人士都对这一品牌的消失感到可惜,米拉麦克斯曾在艺术片领域作出很多成就,如《我的左脚》(英国病人)、《低俗小说》(莎翁情史)、《芝加哥》等。米拉麦克斯公司创办之初,坚持低成本独立制作,在世界范围内带动了独立电影的风潮,并获得奥斯卡的认可。公司创办人温斯汀兄弟善于用公关手腕把自己的影片推上奥斯卡宝座。2005年,由于在制作电影的方略上有严重分歧,温斯汀兄弟被迫放弃“米拉麦克斯”品牌。

选摘自《中国电影报》2月4日

艺术名人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纳粹德国粉饰太平的帮凶?

艺术名人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纳粹德国粉饰太平的帮凶?艺术家个人行为该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政治含义?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即对沦陷区的法国文艺界来说,在挺身而出和同流合污之间有着层次丰富的灰色地带,一种微妙的互相利用”,斯波兹说。同样的情况,甚至出现在被欧洲艺术和媒体界誉为巴黎抵抗精神化身的毕加索身上。尽管如此,戴着丝绒手套的铁手仍然是铁手。“在表面繁荣之下是巴黎乃至法国整体文化生命活力的下降,严格的检查制度,创作者出于生存恐慌而进行的自我阉割”。

审判与耻辱 1944年,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计划开

始执行,而巴黎文艺界升平气氛依旧。德国战败后,地下抵抗运动和戴高乐政府连一份文艺界“通敌名单”都难以拟就。政府发现,将法国文艺界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送上法庭,既是让全体人民蒙羞,也是让法国继续在精神文化领域蒙受损失。“通过文化,法国帮助它的人民度过了历史上最为黑暗屈辱的时光,并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自己的尊严,然而其代价不可谓不重:巴黎,这个欧洲艺术与思想的灯塔,连同它最出类拔萃的一代艺术家被蒙上了难以去除的耻辱。”

选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5期,朱步冲/文

本版责编:饶翔王杨